



武跃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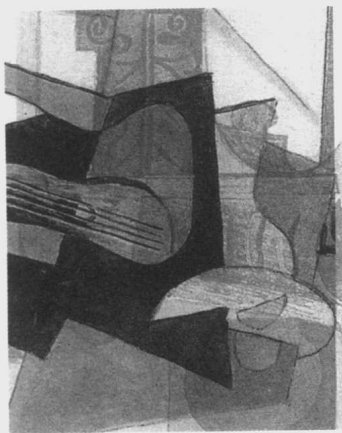
西方

现代主义文学的 个人乌托邦倾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





武跃速 著

丛书主编 蒋承勇

西方 现代主义文学的 个人乌托邦倾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武跃速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444-2

I. 西... II. 武... III. 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西方国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851 号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作 者:武跃速

责任编辑:吴芸茜

封面设计:王晓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9.875

插 页:2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2200

ISBN 7-80681-444-2/I·067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跨入新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球化”成了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的时代”^①。确实,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②。这说明,全球化时

2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信息化的 21 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间有“一体化”的倾向。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趋同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状态,文化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反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取代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认为,文化上的全球

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人类文化无可抗拒地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与重构的境遇中。现实的情形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J·希利斯·米勒则宣告了文学时代的“终结”。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③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④。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衰退与沉落,文学工作者显然很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和趋势。对文学的这种命运是否有可拯救之法,笔者无力解答,也无意于去解答。但我认为,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革新。也许,这样做无所谓是为了不让“文学研究的时代”成为“过

去”，而是为了适应这个文化大变革的时代，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都已付诸实践，那么，在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需有一种自觉。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及其方法有更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与借鉴的必要。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⑤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更强的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认同，对推动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都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所以，比较

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也即比较文学与文化,是天然地联为一体的。也许,正是把比较文学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正是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才有可能使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浪潮的生机,而且,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有可能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境遇中,在人类文化的变革与重构的大舞台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正是基于上述一些想法,我们编撰这套“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我们试图把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与体认,为中外文学的研究,为 21 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作点微薄的贡献。

2003 年春节

注释:

① 王宁:《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盛宁:《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见《外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1 期。

③④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见《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⑤ [美] 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

序

刘象愚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西方现代主义引入中国后，我们对这个术语及其内涵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现在许多人都明白，现代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出现的一种包含众多流派的激进的文学艺术思潮，它的主要精神是反叛传统，强调某种“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学术界明确地称为“现代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现代主义已经从最初的文学艺术领域渗透到哲学、宗教、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中。然而就文学艺术而言，其基本性质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譬如说，在意识形态上，它要同 19 世纪中产阶级的道德观、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的乐观精神以及理性中心主义决裂，呈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状态；在审美形式上，它强调实验和创新，反对因循线形的叙事模式和精心构筑的、有序统一的、完整封闭结构，推崇新奇的、无序的、变形的、破碎的话语形式。因此，在总体上，现代主义表现出鲜明的反传统、非理性倾向，对社会与人性的进步流露出浓重的悲观情绪，呈现出明白的无政府主义形态。

然而，现代主义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潜藏在非理性、无政府主义表面下重建某种新的理性与新的秩序的精神，以及蕴涵在悲观绝望外壳中重建某种信念与理想的渴望。而这一面，我们却很少论及，当然也认识不够，而这一面也正是武跃速博士这部书稿的主

2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旨。书稿的题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明确地标示了作者论述的方向。

在我看来,这部书稿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书中采用的“个人乌托邦倾向”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概念,它既比较确切地指明了现代主义文学总体上某种具有正面意义的价值取向,又厘然分清了不同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在表达这种价值取向时的个性色彩。这就使我们看到从另一面切入的现代主义既有总体上的大体一致性,又有个体上的差异和多样性。这样一种表述和角度无疑是符合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际的。作者梳理了“乌托邦”这一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结合文学史脉络中“乌托邦”意义的演变,坚持了这一概念指向理想、指向未来的精神内核,同时阐明了她所谓的“个人性”的基本含义,这就使“个人乌托邦”这个概念具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合法性,从而为本书的理论阐发提出了一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纲领。

第二,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既具有理论思维上的细腻与严密,又具有文字阐述上的基础与功力。无论是象征主义诗人们在哲理的沉思中领悟诗意的栖居,还是存在主义作家兼哲人们在“自由选择”的不懈追求中探索“个人”意义生存的各种可能性;无论是艾略特宗教关怀中闪烁的精神光彩,还是伍尔夫心灵冥想中流露的人性渴求;无论是卡夫卡在面对一个荒诞世界时的批判意识,还是奥尼尔在灵魂拯救中的终极追寻,作者都能结合具体的文本做抽丝剥茧式的分析与阐发。书中的一章一节就仿佛是一篇篇富含哲理的散文诗,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娓娓的阐述吸引,随作者去沉思其中的深意。全书所散发出的理论深度与诗意美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就“现代主义”而言,作者重点讨论了艾略特、卡夫卡、伍尔夫、普鲁斯特、叶芝、萨特、加缪、奥尼尔等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涉及了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主

义文学艺术流派,这个范畴大致上是恰当的、具有代表性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样一个范畴是绝对完满的、精确的,例如,在重点讨论的作家名单中至少还应该加上乔伊斯和庞德,涉猎的流派中也应该补上表现主义与荒诞派,但是,倘若我们不求全责备,我们就应该说,作者对现代主义的认识是基本到位的、明确的。界定现代主义的大致范畴就将这部书稿的论述置于一个正确而坚实的基础上,从而赋予作者的讨论一种清晰的针对性,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跃速是2000年考取博士研究生的,入学前就已经在高校讲授外国文学多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奠定了厚实的专业基础,她读书用功,又善于思索,因此,常能发人所未发。作为一个老师,我常为在教学相长中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我的弟子中,跃速是常能在不经意中给我以教益的一个。不学无以广思,不思无以明学,好学而能敏思,正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基本品质,也是一个学者能够迅速成才的必备条件。毫无疑问,在学与思两方面,跃速都是十分出色的。这本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专著正是她三年来勤思苦学的一个明证。当然,这部书稿仍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题记：

**“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道找不到的门，
在哪里，在何时？”**

**“在自己内心的城市里，
在自己灵魂的大陆上……”**

——托马斯·沃尔夫《天使，望家乡》



总 序

蒋承勇

..... (1)

序

刘象愚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家园：诗与思的建构

一、里尔克：存在的领悟 (27)

二、叶芝：“驶向拜占庭” (45)

三、普鲁斯特：反抗时间流逝 (63)

四、超现实主义：人性的全面解放 (78)

第二章 神性追问与意义秩序：艾略特的宗教精神

一、“荒原”深处的祈盼 (95)

二、皈依天主教 (106)

三、时空中的意义呈现 (115)

第三章 和谐与爱：伍尔芙的人性渴望

一、宇宙人生的冥思 (133)

二、“生命之树上的蓓蕾” (143)

三、灯塔意象 (150)

第四章 顽强的自我：卡夫卡的亮光

- 一、“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 (171)
- 二、个体面对群体的灵魂坚守 (186)

第五章 沉浮中的灵魂拯救：奥尼尔的终极追寻

- 一、宗教意义上的精神救助 (203)
- 二、尊严寻求与情感诉求 (213)
- 三、无限意义上的“天边外” (224)

第六章 意义生存：西西弗斯的努力

- 一、萨特：人的“自由选择” (234)
- 二、加缪：清明意识中的道德人格 (246)
- 三、历史尴尬中的人性亮光 (255)
- 四、人与“绝对”的较量 (269)

结语

..... (283)

参考文献

..... (291)

后记

..... (297)

导 论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包括诸多流派的总称,时间上大约跨越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形成西方 20 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壮丽景观。但它并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概念,学界对其内涵的解释众说纷纭,而且下限又与后现代主义相纠缠,因此使得一些作家的归属似是而非,难于断定。然而,只要提起 20 世纪前半叶那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振聋发聩的文艺运动、文学主张,以及类似艾略特、卡夫卡这样的经典大师,人们还是有一个大体轮廓上的认同。一般来说,现代主义文学大致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信息:第一,对传统表现方式的反叛,着力寻找与现代感知经验相一致的形式,在不断创新中显示出内向性、抽象性的风格;第二,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表达着 20 世纪精神世界的意义匮乏感和人类形而上存在的绝望感;第三,在艺术的自律秩序中寻找现代人的意义归属,表现出作家诗人对终极家园的渴求。

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前两点自然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怀疑甚至颠覆,如马·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在他们著名的《现代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主义艺术是“人类创造精神的基本震动,这些震动似乎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重要的信念和设想,把过去时代的广大领域化为一片废墟”^①,具有一种否定性倾向;第三点则是对精神家园、人生意义的执着,表现了对传统终极价值观念藕断丝连、欲罢不能的深层情结,显示出一种肯定性求索。由于这种“肯定性”的东西在历史现实中已是四分五裂,而且他们又是在

一个大的祛魅的文化背景下去追索的,便体现着更多的个人性色彩,因此,本文将此命名为“个人乌托邦”。

笔者认为,中外学界在对现代主义文学反叛传统、表现某种现代绝望感等否定性方面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深入透彻,特别是国内,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已在影响着一代甚至两代读书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识,但对蕴涵其中的“个人乌托邦”倾向还缺少足够的注意。而这一点正是现代主义文学借以栖身的灵魂所在地,也是它与传统文学忽隐忽显的连接线索。近些年国内的一些个案研究已经提及所涉作家的正向追求问题^②,国外也早出现过类似的或零散或集中的对此类主题的探讨^③,因此,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去梳理现代主义文学中存在的乌托邦倾向,掘出其创作中沉潜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念,正是本文所要努力的方向。

那么,如何理解“个人乌托邦”这个命题呢?

—

众所周知,乌托邦的概念出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幻想小说《乌托邦》。小说采用对话形式,详细讲述了那个叫“Utopia”的国家情况,从政治体制、法律宗教、生产方式,到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家庭生活等,都体现了平等和正义。人民安居乐业,没有贫穷和不公,没有私有财产,“人尽所能,按需分配”,过着幸福的日子。显然这是一个体现了近代人文思想的完美国度。莫尔运用希腊文的词根(ou 意为“没有”,topos 意为“地方”^④)生造了Utopia 这个词,他在《乌托邦》的结尾说:“我愿意承认,乌托邦社会中固然有许多事情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各邦实现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期待。”^⑤从此“乌托邦”就成了想象中完美社会形态的代名词,而且延伸到各种精神话语领域,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思绪。

莫尔的《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型化的概念。同样描述属于想象中完美的社会形态的,在其之前,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其之后,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是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著,是典型的乌托邦作品。柏拉图要在理想国中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作为国家,在智慧的哲学家领导下,其他人都忠诚地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形成和谐的有机整体,使国家成为实现正义、善、敬神的国度;作为个人,在体育和音乐的教育下,成为在节制中具有和谐心灵的强健公民,具备“好的精神状态”。这样一个国家,显然是柏拉图的“理念”和斯巴达的权力体制相结合,使得先验思想成为可以实施的制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最高的王是太阳,很像柏拉图的哲学家,在他的统领下有三个部门领导,分别叫威力、智慧和爱,分管国中所有事项。不同的是所有的官员都经人民“大会议”选举而出,这些人都应该没有缺点,体现了康帕内拉的近代民主和人文思想。康帕内拉在《论最好的国家》一文中说:“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建立这种国家的思想,我们所写的一切也决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榜样。”^⑥他的声明表达了近代人文自信在审视历史现实时的思想力度。

“乌托邦”的概念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完满生存的极大幻想,其中承载着不同作者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思想价值观,自然也是他们各自所属时代精神理想的折射。其实,类似的精神幻想早已存在于远古人类的神话传说中,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黄金世纪”,描绘了一种颇为自在的生活状态,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和神祇一样,不会衰老,不生疾病,一生享受盛宴和欢乐,是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想象中的幸福和完满;基督教传说中开头的“伊甸园”和基督复活后的“新天新地”、新的“千年纪”,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人间天堂等。这些设想是人类早期的理想主义结晶,在宽泛的意义上都属于一种乌托邦构想。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近现代以来的一些乌托邦历史实践使得